



爱巢 张大林 摄

◆生活手记

我那硕士论文背后的故事

陈田

我是1982年由南京大学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师从孙盘寿先生。

那时学术资讯较少，而我对专业指向性又很执着，所以大学四年虽学了很多地理类和城市规划类课程，但总把它看作是我学好城市规划专业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之一。

此外，在大学四年级和研究生阶段，我还特意选修计量经济学、运筹学，以及多元逐步回归、趋势面分析、最优化理论等属于数学规划类的课程。我报考研究生志愿时，也是按照城市——城市规划——城镇体系——区域城镇化的逻辑，选择了城镇体系这个方向。

1984年我从研究生院回地理研究所后，在与导师商量论文选题过程中，正值导师以西南地区为例，在《地理研究》上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城镇职能量化分类研究的论文，受此影响，我暂定以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城市职能结构分析与优化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逻辑与方法构建。

确定了论文着眼点之后，我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思考和构建论文框架。记得我提交导师过目的最初大纲，是包含这样四个部分：即城镇体系合理边界的地域划分；体系中的城市职能综合特征的量化识别；职能结构合理性的背后逻辑与判别标准；优化职能结构的路径选择。很显然，能否做好这篇文章，解决第一部分的地域划分就成为内在逻辑关联的前提条件。

那时，我手边拿到一本由国家建设部编辑的《198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那上面的统计指标项很丰富，适合开展量化横向比较研究。

在我读研究生的那个年代，关于区域城镇体系的实证研究，我印象深刻的有苏锡常城镇体系研究和长珠潭城市群规划研究。在这两个体系研究中，对城镇体系地域范围的划定，多以定性+

交通流叠加来判别归属，我认为，若以这样的思路去解决全国的划分问题，既不现实，且分层整合也有问题。因此，要做好城镇体系划地域范围的合理划分，必然要走或只能采用系统的计量分析模型的思路，自上而下的分层处理，然后以量化确定哪些城镇属于这个体系范围。于是就有了思考如何划分的问题。用什么指标划分？划分的逻辑又是什么？总不能如湖北省的鄂东地区是一个体系，鄂西地区是一个体系，然后整个湖北省又划一个。如果这样做，那职能结构的合理性又怎么界定？我的论文逻辑就这样出来了。

当时孙先生身体不好，他为人又特别谦和，放手让我怎么想就怎么做。

我数学比较好，就很强调背后的内在逻辑，强调验证过程，那篇硕士论文大纲，也只相当于最初设想的四分之一内容。

那时我们经济地理部连一台X286台式计算机都没有配备，论文中的小计算，我可以依靠两台PC1500来完成，但完成 15×15 矩阵因子分析，我就不得不求助于在综考会读研究生的南大水文专业校友许有鹏，因为他手里有台X286苹果机。那时做一次运行大约需要6小时，我只能利用周末时间来完成。而我们917大楼周末又经常停电，一遇停电就得重新来过，这个过程，我前后经历6次方才完成。当时计算程序也要自己编写，靠自己测试完成，每个参数要自己调试，还要看它的背后逻辑是否合理。

我的论文完成后，获得了1985年首届中国城市地理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资格。论文核心结论于1987年公开发表，同时我申报的《区域生产力布局定量方法与模型研究》获得首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筹备期第一批资助项目。当年，我们地理研究所也仅有两个项目获得了资助。

◆逝者追忆

父亲在江塘的日子里

汪德平

1970年代初，父亲担任江塘公社党委书记，他一干就是八年。为了在江塘大面积推广袁隆平研发的杂交水稻，父亲带领公社干部下沉到各大队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少回家。每年学校一放暑假，母亲就让我去江塘看望父亲。

有一次，父亲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带我下乡，我坐上后车架，行驶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父亲一路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在江塘工作的经历和故事，最后深有感触地说：“基层政府工作责任重大，党、政、财、文、军（民兵）都要管，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既然组织上把我放到这个岗位，就要尽力而为，才能对得起江塘人民啊！”

自行车一路颠簸，不知不觉便到了毕岭大队的一个村庄，父亲赶忙集中各大队干部召开推广杂交稻技术现场会，由于当时农民思想普遍比较保守，怀疑杂交稻产量，有不少抵触情绪。父亲在会上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对杂交稻如何选种、育苗、施肥、移栽，田间管理等也一一做了讲解。然后父亲卷起裤腿，赤脚走进水田，为大家示范插秧，反复讲解秧苗的行距、间距统一规范要求……毕竟父亲是庄稼人出身，插秧也是能手，只见他手脚配合默契，沿着秧绳引线有节奏地后退，娴熟地分秧栽插，手下的秧苗形成了一条条笔直的不断延伸的绿线，引得大家啧啧称赞。

中午我们安排在农民毕大爷家就餐，这家人特别热情，用平时舍不得吃的水煮鸡蛋、辣椒炒咸鱼招待我们。饭后，父亲习惯地从衣兜里掏出五毛钱、六两粮票欲付午餐费，毕大爷抓住父亲的手怎么也不肯收。父亲待他们不注意时，把钱和粮票折成小方块偷偷塞进饭碗底下辞谢而去。他们收拾碗筷发现后，忙追出门外高喊：“汪书记……”这时自行车已驶出数百米远，我和父亲不停地向他们摆手，毕大爷一家站在路边遥望着，久久不肯离去。

有一次，公社附近有农民大叔拎来十几个鸡蛋和两只罐头瓶装的青椒炒咸鱼，送给父亲说：“汪书记工作太辛苦，食堂伙食又那么差，我们看了心里难过，这点东西也拿不出手，请收下吧！”父亲当即谢绝，说：“谢谢你们，心意我领了，鸡蛋绝对不能收，‘双抢’你们更辛苦，再说你们平时生活开支都是拿鸡蛋换油盐啊！”大爷哪里肯依，丢下篮子就跑了。父亲无可奈何，只得将鸡蛋交给公社伙食团，让他们按收购价计算付费，然后将咸鱼分成若干份送到餐桌，喊了一声：“大家都来加餐！”

次日，公社党委召开了基层干部会议，会后有几位青年干部来到父亲宿舍，在父亲与他们交谈中方才得知，江塘这批青年干部，有的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有点问题，有的因工作经验不足犯了点小错……但他们人品好，有文化，有能力，不保守。当时对这批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人颇有争议，父亲主政江塘后，客观分析原因，反复沟通，积极做工作，他不

怕担责，发展这批青年入党并大胆提拔起用，让新生代担任大队主要领导职务，加速了农村经济和各项工作的开展。父亲常说：“江塘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粮食增产增收、植树造林等方面多次被县委评为先进，所取得的成绩与这批青年干部是分不开的。”父亲每每言及，那种内心的快乐、愉悦之情都溢于言表。

傍晚，父亲对我说：“今晚我要下乡处理一起水利纠纷，明天还要到各大队督查双抢进度和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事情做不完，我也顾不了家，你明天回去，代我给你妈妈挑挑稻草，给菜园地浇浇水吧。”我点头嗯了一声。他便骑上“永久”，慢慢消失在夜色之中。当晚，我辗转难眠。

次年寒假，是我最后一次来江塘。此时正值农田水利冬修时节，父亲一早带我去了太怀分干渠道。这是我县1970年代总干渠扩建配套工程。分干渠的江塘段开凿全面铺开，只见渠道工地红旗飘飘，人山人海，绵延数公里，宛如一条巨龙。公社党委一班人带领近万名民工奋战在工地，由于无机械设，土石方全靠人工挖肩扛，工作十分艰苦。那天下起了小雨，父亲身穿军式雨衣和高筒防滑雨靴，这是父亲任县水利局副局长时统一配发的。他走上渠道与民工一起用铁镐开挖、取土、筑坝，干得满头大汗。同时还帮助施工队员进行渠道、地形、水文测量，土方计算和工程竣工验收等工作。这些专业技术活对于父亲可谓轻车熟路。父亲早在1950年代末就毕业于安徽水利干校，可以说是本县第一代水利专家了。太宿、太怀、太徐分干渠在原来基础上几经扩建修缮，如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水系纽带贯穿了江塘的南北东西，为江塘3000公顷良田的引水灌溉，防旱排涝，保产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

时光荏苒，不觉到了1978年春节，父亲回家过年带回了那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雨衣和那双刷得干干净净的胶靴。他说：“组织已经安排我到新的工作岗位了，我即将要离开江塘，水利工程修建圆满竣工，雨衣和胶靴该上交水利局了。”我和母亲大惑不解，母亲说：“明明是组织上配给你使用的，再说穿了十多年，上面也没规定找你收回，你又何必呢？”父亲说：“从感情上讲，我也舍不得，但是不行哪，人要自觉，公家发的也不能算是自己的，绝不能揩公家油水啊！”春节一过，父亲带上雨衣胶靴，骑车奔县城去了。

父亲很平凡，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是尽到了一个基层政府领导的职责，却赢得了江塘人的交口称赞。

